



编目思想史

A history of Cataloging Perspectives

高 红◎编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编目思想史

A History of Cataloging Perspectives

高红 编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目思想史/高红编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013-3608-1

I. 编… II. 高… III. 编目-思想史-世界 IV. G2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837 号

书名 编目思想史

著者 高红 编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1.375

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9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608-1/G·747

定价 38.00元

前言

当博尔赫斯深情地呼唤“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的时候，图书馆人一直在为如何才能将图书馆打造成人们心中天堂的模样而不断思考，不断尝试，不断探索。

近代以来，文献编目学的发展日渐活跃，巨擘频出，观念日新。特别是近年来，IFLA发表了《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RBR)，提出了书目控制理论的新的模型。该模型一经问世就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更是被期许为颠覆性的创新之作，仿佛投入湖面的一块重石，激起层层水晕，不仅带动了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RAD)、主题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FRSAR)概念模型的产生，更是推动了《国际编目原则声明》、RDA、OPAC等文献编目学、图书馆学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对我国编目领域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无限的思考。然而，任何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探索前因，展望未来，正是学术史的研究目标，也是本书的创作初衷之一。

早在轴心时期，随着文献的产生，中西方就产生了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在西方，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目录是公元前250年古希腊诗人卡利玛赫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所编制的馆藏分类目录。此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西方文献目录经历了从“财产清单”向“查检式目录”的过渡历程。

19世纪是西方编目史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时期，是编目知识理论化、编目活动规范化的时代。1841年，大英博物馆馆长潘尼兹的《九十一条》作为西方近代第一部完整的、系统的编目规则问世。此后，杰维特的《杰维特规则》、卡特的《字典式目录规则》等一系列重要的先行理论先后诞生。20世纪初，“英美规则”和《普鲁士规则》同时问世，确立了西方世界两大编目体系并立

的格局。20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西方编目学进入了危机、转折的新时期。编目学家从对“经验主义”的整理和继承转向对编目学理论的理性思辨,产生的奥斯本的《编目的危机》、柳别斯基的《编目的规则和原则》等论著,都对编目的现状进行了理性的“扬弃”,引发了此后几十年间编目条例的不断修订和国际编目原则的产生,最终建立了国际化的编目体系,实现了世界书目控制。

同样,在东方,在中国,也在进行着对图书编目的不断探索。王重民先生认为,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目录工作的雏形。此后,虽然孔子删定六经体现了编目发展的萌芽,但是直到几百年后的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撰成《七略》,才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了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系统目录。而且,中国传统目录学具有“重分类,轻编目”的特点,在编目上注重对分类法等文献内容的揭示,在漫长的中古岁月中,对于分类法的探讨经历了七分、五分、四分等多种形态,涌现出班固、荀勖、王俭、阮孝绪、魏征等杰出的编目实践家。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文献数量激增,官修目录与私家目录并举。郑樵成为对中国古代编目学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第一人。晁公武、陈振孙、尤袤、马端临、胡应麟、钱曾、张金吾、朱彝尊等都是一代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清代的章学诚、纪昀更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黄金时代的集大成者。

20 世纪以来,随着图书馆开放运动的展开,杜定友、裘开明和刘国均等人先后将西方英美等国的编目思想和方法引入国内,中国编目事业重新起飞。经过几代图书馆人的努力,《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相继出台,中国文献编目工作更加国际化,中国文献编目事业开始步入腾飞阶段。中国与西方的编目方法存在很多差异。中国的传统编目注重内容,而西方编目则注重形式;中国编目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的功能在于方便地获取图书。近代以后,两者日渐融合,特别是随着 FRBR 模型的提出,两者之间有了殊途同归的味道。虽然中西编目之间的异同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是二者

的灵魂却是一样的。

纵观文献编目学的发展历程，坚守的是朴素的实用主义原则。除去浮华的文字修饰，千百年来，图书馆学者一直以实用的功能主义为导向，无论是古老的“财产清单”、传统的卡片目录，还是现代的机读目录、联合目录，都是在实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下最有效的编目方法。而且，编目学者崇尚实用，但绝不因循，他们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寻到了最适宜的方法。

纵观中西编目发展的历史，坚守的是不断创新的精神追求。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变革不断对世界编目学界形成新的冲击，提出新的挑战，各个时代的编目学家只有保持创新的意识才能紧紧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图书馆学者及时开发新的编目方法、新的编目理论和模型。MARC 格式的出现就是图书馆人紧跟社会需求变化的最好的例证，此后，各国学者又针对机读目录网络化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现在，不满于现状的编目学家开始借助新的信息管理理念，试图通过元数据、实体/关系模型等新的路径重新编码信息资源，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管理。

纵观编目学的发展历程，坚守的是以人为本的服务原则。不论中西方编目思想有多少差异，始终以人为最终的服务目标，在目录的编制中始终体现的是人本的思想。西方编目理念中个人的作用，反映在编目学上即是一直倡著者目录，重视“著者”的概念。而中国传统的内容编目的诉求，更是直接体现了目录编制为人服务、教化民众、导读用户的作用。无论编目方法如何变化，无论编目形式如何更迭，实用主义、创新意识、以人为本，都是编目学发展中不变的精神内核。

同样的，作为编目思想发展史的传统之作，《编目思想史》的编著者们坚守着创新和实用的双重标准，几易寒暑，终于脱稿付梓。本书主要是在客观梳理中西编目思想的发展脉络、追溯世界编目学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编目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进行客观而详尽的分析，为今后我国图书馆编目工作及书目服务提供新的理念和

理性思考, 弥补国内编目思想史领域的研究空白。

本书力求强调整个文献编目史的完整体系, 共分八章。第一章以西方编目思想的早期探索为开端, 阐述 19 世纪西方编目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一系列重要的先行理论, 探讨世界两大编目体系的形成、现代西方编目思想的深刻变革、世界书目控制的最终形成与发展; 本着以西带中的理念, 第二、三章探索了中国古代文献编目思想的主要理论成就以及中国近、现代文献编目思想的发展历程; 第四章介绍了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概念模型; 第五章介绍了《国际编目原则声明》(*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的产生、内容及与巴黎《原则声明》的比较; 第六章介绍了 AACR2 的最新修订版“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的历史背景及核心内容; 第七章论述了 FRBR 对文献编目工作的深刻影响, 包括对编目规则、对书目关系的表达以及对图书馆 OPAC 的影响; 第八章对国际化环境下文献编目学的发展趋势, 特别是对今后我国文献编目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以及书目服务方面提出建议。

本书由高红拟订框架和详细大纲, 由以下作者完成初稿, 最后由高红统稿定稿。第一章, 高红、王松林、刘玉绵、吴晓静、罗翀; 第二章, 张玮、靖翠峥; 第三章, 王洋、张玮; 第四章, 高红、罗翀、张玮、王洋; 第五、第六章, 高红; 第七章, 高红、吴晓静、吕艺; 第八章, 高红、王松林、曹宁、丁建勤、顾犇。

很多人对这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帮助。2005 年, 作者申报了国家图书馆馆级科研课题“文献编目思想史”并获得批准。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王松林教授为本书的内容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贡献西方编目史讲稿近 3 万字。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富平、汪东波等作为课题鉴定专家, 对内容和文字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课题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竭尽全力, 2007 年春节期间都放弃了休息, 共同努力完成了编写任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金丽萍老师为本书

的顺利出版付出巨大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面向图书馆、情报机构的信息组织专业人员，相信对高等院校图书馆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各类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教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全体编著者为实现本书的目标竭尽全力，但由于认识水平和时间的限制，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决定把它奉献给读者。倘若它能够引起编目工作者的共鸣，能够引起同行们的思考和批评，那么“不当不妥”之处又有何妨？

编著者

2008 年 3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西方编目思想史	1
第一节 西方编目思想的早期探索	1
第二节 现代西方编目思想建立的基础	6
第三节 世界两大编目体系的形成	29
第四节 现代西方编目思想的深刻变革	41
第五节 世界书目控制的形成与发展	58
第二章 中国古代编目思想史	91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编目思想的起源和奠基	92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编目思想变革	99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编目思想的成长与发展	103
第四节 宋代文献编目思想的繁荣	107
第五节 元、明时期编目思想的中衰	112
第六节 清代编目思想的鼎盛时期	116
第三章 中国近现代编目思想史	125
第一节 近代中西编目理论的碰撞与融合	125
第二节 中国文献编目标准化的进程	129
第三节 中国文献编目形式的发展历程	141
第四节 中国文献编目合作方式的变迁	143
第五节 中国规范控制思想的本土化过程	147
第四章 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 (FRBR)	154
第一节 FRBR 概述	154
第二节 实体及属性	158

第三节	FRBR 关系研究	178
第四节	国家书目记录的基本要求	199
第五章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215
第一节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发展规划回顾	215
第二节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的内容	219
第三节	“法兰克福声明”与巴黎《原则声明》的比较	228
第六章	资源描述与检索 (RDA)	236
第一节	RDA 的历史背景	236
第二节	RDA 的基本目的	238
第三节	RDA 的预期内容及特点分析	240
第七章	国际编目新理念新标准对文献编目的影响	250
第一节	FRBR 对编目规则的深刻影响	250
第二节	FRBR 模式下书目关系的表达	259
第三节	FRBR 对图书馆 OPAC 检索功能的 作用与影响	271
第八章	中国文献编目发展的路向	289
第一节	FRBR 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 机读格式中的应用	289
第二节	FRBR 模式在规范控制系统中的实践探索	298
第三节	从《国际编目原则声明》看《中国文献 编目规则》的修订	316
第四节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兼容化之路的探索	328
第五节	文献编目学的未来发展	340

第一章 西方编目思想史

第一节 西方编目思想的早期探索

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符号,便相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文字载体,如埃及的纸莎草、罗马的羊皮纸等,这些是历史上最早的图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献。书籍日益增多,由于保存和利用的需要,应运而生了“目录”这一工具,同时,“目录”概念也就随之产生。在西方编目史上,人们对目录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由局部到整体的漫长过程。这一知识的积累过程,是编目思想的必然准备阶段。而这种“史前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直觉”或“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同时呈现着以后各种编目观点的胚胎和萌芽。

一、“目录”概念的起源

在西方,“目录”(catalog 或 catalogue)一词源于希腊语的“katalogos”。其中,“kata”是“根据”、“按照”的意思,“logos”有“词语”、“因素”、“次序”、“理念”的含义。由此看来,“katalogos”的基本含义可以理解为“将其内容按照某种合理的方法编排组织起来的著作或一组事物的一览表”。^[1]据记载,和原始图书一样,国外最原始的“目录”也是以黏土板形式出现的。目前有

[1] Ruth French Str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alog and cataloging codes. In: Ruth French Strout ed. Toward a better cataloging code: papers presented before the twenty-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3—15, 1956. 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1957: 4

据可查的西方最早的目录是公元前 250 年古希腊诗人卡利玛赫 (Callimachus, 前 305—前 240) 编制的《在全部学术领域指引人们写作之表记》。卡利玛赫的这套目录是当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藏分类目录, 他把人类知识分为八大部一百二十大类, 类下或以著者字顺或据年代顺序组织款目。款目上书目信息的记录也是随意的, 大体上有著者姓名、生平介绍、正文行数和开头文字等。值得注意的是, 在当时书名还未成为编目的内容时, 著者项常常被利用。可见, 西方编目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著者概念而忽略书名, 取著者为主要款目标目是有其悠久历史的。

二、目录的原始形态——财产清单

现代编目学家柳别斯基 (Seymour Lubetzky, 1898—2003) 曾精辟地指出: 16 世纪包得利 (Thomas Bodley, 1545—1613) 以前的早期目录基本上都是一份财产清单。^{〔1〕}所谓“财产清单” (inventory lists), 大多是在粗略的分类下不规范地著录图书, 类下款目的排列也没有形成便于检索的序列。其职能是目录的每一条款目均为一部文献的简单记录, 以说明该文献的存在, 并用作清点财产时的查考, 即整个目录代表全部收藏。体现这一职能的书目记录结构, 在描述部分是极其简单的, 一般只提供有关书名和著者等极为有限的书目信息; 其检索点部分也不成系统, 或依文献到馆先后, 或依著者姓名字顺, 或依著者年代排列。

目录财产清单的职能在进入中世纪后发展极其缓慢, 这是由于古代文化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衰落, 以及处于封建宗教统治下的西方国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从而极大地妨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所

〔1〕 Seymour Lubetzky. Ideology of bibliographic cataloging: progress and retrogression. In: Maurice J. Freedman, Michael Malinconico ed.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the catalog: proceedings of the ALA's Information Science & Automation Division's 1975 and 1977 Institutes on the Catalog*. Mansell/London: Oryx Pr., 1979: 5—8

致。当时的图书馆为寺院所垄断，藏书不为公众所用，因而那时的目录只需起一种登记注册的作用。然而，到了13世纪末期（1250—1296），在英国编目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目录类型——联合目录的雏形。据考证，这部联合目录（*registrum librorum angliae*）出自修道士之手，记载了当时英国183所寺院的藏书情况。这是西方最早的合作编目和资源共享的思想体现。

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古典文化的复苏，寺院藏书大多数转为学院或私人藏书，读者范围也从少数达官显贵、教士和藏书家扩大到学生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财产清单式的目录不仅著录极不规范，也不便于查检，因而读者对款目的著录及目录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14、15世纪，“分析”和“参照”的思想已融入目录。16世纪，编目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出现了以下三种较为著名的编目方法。

第一种：1545—1548年盖士纳（*Conrad Gesner*, 1516—1565）的编目方法。当时盖士纳建议将图书按书型大小分为大（*mag-nus*）、小（*parvus*）两类。1545年，他出版了《世界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第一卷。该书目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①第一卷（主要部分）是有书名、主题、注释的所有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图书的著者字顺目录，其款目的排列是依著者教名（*Christian name*）的次序。盖士纳当时已意识到这种款目组织方法的不便性。②第二卷是分类目录（*pandectarum*），即将第一卷中著作按主题内容划分为21个大类和250个细目。此外，在该套目录中还使用了“参见”及“字顺标题索引”的方法。同时，盖士纳还主张在图书款目上标明排架号（*press-mark*）。

第二种：1560年特里弗勒斯（*Florianus Treflerus*）的编目方法。特里弗勒斯十分重视目录的作用，他提出一个图书馆必须具备以下五种目录：①著者字顺目录；②分类排架目录；③主题索引；④主题字顺索引；⑤保存本目录。

第三种：1595年英国著名书商蒙塞尔（*Andrew Maunsell*,

d. 1595) 编制的书业目录。这部目录由三部分组成: ①神学; ②算术、音乐、航行、战争等; ③人文科学、语法、历史、逻辑、修辞、法律、诗、政治等。在蒙塞尔的目录中体现着如下思想, 这些思想可谓现代西方编目条例的雏形。

- 提倡分类字顺目录;
- 规定个人著者应著录在其姓氏而非教名下;
- 匿名著作取书名或主题著录;
- 译著以原著者、译者、主题著录;
- 提出了类似今天统一题名的原则, 主要用于《圣经》著作。

三、目录的初级形态——查检式目录

编目学家诺里斯 (Dorothy May Norris) 曾对 16 世纪的编目活动进行了总结, 他认为: 随着 16 世纪的结束, 无计划性的、个人的编目方法也趋向结束, 虽然第一部编目规则尚未诞生, 但人们正试图寻找一种体系。^[1] 随着 17 世纪的到来, 目录也从最原始的“登记式财产清单”进化到其初级形态“查检式目录” (finding lists)。所谓“查检式目录”, 是记录图书馆文献的简略清单, 通常记载的信息有著者、书名、分类号或索书号。这种目录的主要特点有: ①以检索为目的, 即用于查找特定文献的存放位置; ②目录组织与排架顺序相一致; ③著录内容简略。

17 世纪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为科学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也在西方陆续出现。作为西方文明荟萃地之一的英国牛津大学, 其目录工作当时也走在时代前列。1598 年, 包得利计划为牛津大学图书馆订购一批新书, 于是写信给当时的馆长, 以索取一份馆藏目录。那时的目录只是一份馆藏的

[1] Dorothy May Norris. *A history of cataloguing and cataloguing methods 1100—1850; with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ancient times*. London: Grafton & co., 1939: 141

财产清单,分为神学、医学、法律和艺术四大部,四大部下按书型分对开本和四开本等,其下再依著者的字顺排列。当时款目的著录也很简略、不规范。当包得利利用该目录查考复本、订购新书时,他很快便发现这种清单式目录存在两大缺陷:其一,合订本通常著录在第一部图书下,而不是分开著录,因而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馆藏;其二,由于款目著录过于简略,因而无法区分同一种著作的不同版本。实质上,包得利不仅看到图书馆目录必须具备清单的职能以反映馆藏,同时还须具备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即记录、识别特定的图书,以帮助人们确定图书馆是否拥有特定的图书。这就是图书馆目录从“财产清单”向“查检式目录”的演进。

牛津大学的包得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分别于1605、1620、1674和1738年四次编制馆藏目录。其中,1620年编制的目录可谓是编目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首先它是一部分类目录,分为神学、医学、法律和艺术四大类。其创新之处在于每类之下款目的组织依单一的著者姓氏字顺排列,多著者的著作取第一个人的姓氏,并为其余的做参照;匿名著作取书名的第一个词或关键词作为排列依据。诺里斯认为:“这是第一部以著者姓氏字顺排列的图书馆总目录。该目录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目录职能由财产清单向检索工具的转化,是字典式目录的萌芽。”^[1]柳别斯基将这一变化称之为“从清单向目录的飞跃”。^[2]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

[1] Dorothy May Norris. *A history of cataloguing and cataloguing methods 1100—1850: with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ancient times*. London: Grafton & co., 1939: 147

[2] Seymour Lubetzky. *Ideology of bibliographic cataloging: progress and retrogression*. In: Maurice J. Freedman, Michael Malinconico. ed.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the catalog: proceedings of the ALA's Information Science & Automation Division's 1975 and 1977 institutes on the catalog*. Mansell/London: Oryx Pr., 1979: 6

有关图书馆工作的法令，并于1791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编目条例——法国国家编目条例（*The French code*）。这部条例体现了一种“标准化”的思想。^{〔1〕}

四、西方编目思想“史前时期”的特点

综上所述，西方编目思想“史前时期”的特点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1）“百科式”（*encyclopedic*）的学术风尚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普遍强调的是对前人已有知识的收集、积累和继承，而非创新和发展，因而当时十分盛行书目、文集、字典和百科全书等工具书的编制。

（2）突出“著者”的人文主义思想

西方自古崇尚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作用，反映在编目学上即是一直倡著者目录，重视“著者”的概念。

（3）目录职能从“财产清单”向“查检式目录”过渡

体现这一变化的书目记录结构表现为：从无序的、单一的排列次序到以著者姓氏为中心的、多途径的检索。书目著录从极不规范的罗列著者、书名到较为统一的记录图书的著者、书名、出版年、版次等书目信息。

第二节 现代西方编目思想建立的基础

经过前代编目学知识的一般积累，在一定社会环境的作用下，人们开始自觉地对这些思想材料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经验性的总结，从而形成了初具现代编目学规模的系统知识。然而，那时的编

〔1〕 刘静一，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编目条例：法国国家编目条例概述，图书馆杂志，2001（3）

目思想都没有超脱经验范围,都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始终在编目实践的表层现象上进行研究,用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

19世纪是西方编目史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时期,是编目知识理论化、编目活动规范化的时代。以潘尼兹、杰维特、卡特为代表的编目学家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先行理论。

一、编目知识的科学化、系统化——潘尼兹及《九十一条》

1. 大英博物院目录

17至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英国是当时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文化实力强于美、德等国,加之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掠夺,不仅促进了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还获得了世界上大量的文化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大英博物院的藏书。大英博物院的藏书是由皇家图书馆及三家私人藏书合并而成的,其后又购入了英王乔治三世的藏书。藏书量虽然有了剧增,但其管理工作及目录组织却十分混乱,客观上要求大英博物院编制出一套能指导编目工作的著录规则及新的目录。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最杰出的人物当推潘尼兹。潘尼兹思想活跃又兼备多方面的文学素养,因此,在他就任印本部主任的第一年,博物馆的董事会就让他监管编写一部“完整而正确”的、能够覆盖所有馆藏文献的目录。编制这样的目录需要一套统一的、系统的图书编目规则作为基础,由此,潘尼兹创立了划时代的《九十一条》规则。

潘尼兹(Antonio Panizzi, 1797—1879)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名叫摩德纳(Modena)的公爵领地,主攻法律。作为一名烧炭党人,其政治活动使他流亡国外。1923年移居英国后,曾学习英文并教授意大利语言和文学。1831年,潘尼兹就职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开始了编目员的职业生涯。1837年他被任命为印本部主任,1856年担任院长,退休后被授予爵位。大英博物院第一部印本图书目录的编制始于1770年,完成于